

20/世纪/中/国/乡/村/社/会/变/迁/丛/书

(王先明 / 主编)

富农与新富农

—— 20世纪前半期华北乡村社会变迁的主角

FUNONG YU XINFUNONG

ERSHI SHIJI QIANBANQI HUABEI XIANGCUN SHEHUI BIANQIAN DE ZHUJUE

◆ 罗朝晖 著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社

20/世/纪/中/国/乡/村/社/会/变/迁/丛/书

(王先明 / 主编)

富农与新富农

—— 20世纪前半期华北乡村社会变迁的主角

FUNONG YU XINFUNONG

ERSHI SHIJI QIANBANQI HUABEI XIANGCUN SHEHUI BIANQIAN DE ZHUJUE

◆ 罗朝晖 著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于宏雷

封面设计:徐 晖

版式设计:程凤琴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富农与新富农——20 世纪前半期华北乡村社会变迁的主角/

罗朝晖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1

(20 世纪中国乡村社会变迁丛书)

ISBN 978 - 7 - 01 - 008429 - 9

I. 富… II. 罗… III. 富农—研究—华北地区—民国

IV. D693.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97488 号

富农与新富农

FUNONG YU XINFUNONG

——20 世纪前半期华北乡村社会变迁的主角

罗朝晖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龙之冉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字数:308 千字 印张:13.25

ISBN 978 - 7 - 01 - 008429 - 9 定价:32.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总 序

就历史变革的进程而言,中国乡村的结构性变革始于20世纪初年。而且在整整一个世纪的发展进程中,乡村社会变迁始终是中国历史变迁的主体内容,这不仅因为在区位结构中乡村占居绝对的多数,而且因为乡村的生活模式和传统文化,从更深层次上代表了中国历史的传统。即使对于整个近现代史而言,近代化或城市化进程,本质上也是乡村社会变迁的过程。

20世纪初期开始的中国乡村社会变革虽然在世纪末取得了质的飞跃,但变革的历史进程却仍在继续。“20世纪之中国乡村社会变迁”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它不仅是从“长时段”探讨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规律性的课题,而且也是认识当代中国社会变革尤其是农村变革、发展道路的重大课题。这是它所独具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之所在。

当“三农问题”构成制约中国社会发展和实现现代化进程的突出问题时,对它的关注和寻求解脱之路的现实需求,催促着我们不得不对它进行学理或学术层面的分析。诚如已故著名历史学家张荫麟说:“我们的历史兴趣之一是要了解现状,是要追溯现状的由来,众史事和现状之‘发生学的关系’(Genetic Relation)有深浅之不同,至少就我们所知是如此。按照这个标准,史事和‘现状’之‘发生学的关系’愈深愈重要故今通史家每以详近略远为旨。”

(张荫麟:《中国史纲》,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 年重印本,《自序》)因此,由现代回观历史,从历史审视现代,就必然成为现代史学一个不容回避的课题。

毋庸置疑,困扰当代社会发展的“三农问题”,有着近代以来自身形成、发展和演变的线索,当然,也是近代历史进程中人们所曾着力解决的问题。人们早已认识到,虽然近代农民生存条件和生存状态与传统社会并无质的差别,但是,近代以来的农民生存则更多地呈现出社会变迁中的具有时代性的特征。因为“我国古时重士农,轻工商,所以农民的地位非常高尚。”但到了近代以后,“工商业一天一天的发达,工商的地位逐渐提高,……农民的生活一天一天的变坏,他们的地位一天一天的降低……”(杨开道:《我国农村生活衰落的原因和解救的方法》,《东方杂志》1927 年第 24 卷第 16 号)。近代中国农村问题的出现和累积之所以不同于传统时代,就在于它不仅受到社会政治变动所引发的权力结构的动荡影响,也不仅受到农村阶级结构内在规律引发的土地集中和贫富分化的周期性振荡,而且更在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对于乡村社会生存和发展形成的巨大压力和分解力。立足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探讨中国乡村社会变迁,就成为我们历史研究者的责任。

近代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凸显可以说是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乃至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而出现的历史主题。由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既承负着现代化进程也承负着半殖民地化进程的双重困厄,因而乡村社会变迁更多地表现为危机的加剧、交错和寻求解脱危机的基本走向。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问题,必然是超越乡村本身的问题。“我们知道,现代文化虽然并不一定与农村绝缘,但它是附丽于工业发展而进化的。同时在另一方面,由于农业经济之极度崩溃,必然要发生愚贫弱私的现象,农业建设终究不能解救农民

的贫困”(齐植璐:《现阶段中国经济建设论战的批判》,《东方杂志》1935年第32卷第24号)。因此,在探求中国乡村社会发展同时也是探求中国现代化出路的讨论中,汇聚的学识和学科范畴也是极其广泛的:社会学、人口学、经济学、历史学、政治学等等。这些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范畴都将与历史学的实证方法相结合,构成这项研究的特色之一。

历史学的功用,可以在超越一时的模式,在历史解释的重构——比较和检验中,获取更深层的理性认识。

目前,学术界对此还缺乏深入的、系统的研究。此丛书的研究成果多是研究者长期学术积累或在博士论文基础上,经反复修改提高而成,具有学术上的创新性、前沿性和研究主题的系统性、互补性。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王 先 明

前 言

一、选题缘起及其意义

20 世纪 20 年代以来,对于农村阶级和阶级关系的系统认识是伴随着农村社会危机的出现而提上日程的,阶级划分,包括“富农”相关问题始被特别关注。20 世纪的社会变迁中,“富农”或者说“富裕农民”阶层的存在始终是正确认识中国农村和中国社会性质的一个关键问题。且不说“革命话语”下有关“富农”政策的诸多复杂变化,也不必细释“富农”存在的地域性差异,就是土地革命前后富农的消灭和新富农的再生以及世纪末“富裕农民”阶层的又一次崛起所引动的历史性反思,就足以提示这一问题所蕴含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大革命时期,“阶级”的概念和农村阶级的划分,包括“富农”相关问题始被特别关注。在纷繁各色思潮的影响下,各界遵循的意识形态各异,形成不同的思想理念。这一时期“革命”话语滥觞,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层理论盛行于道,“阶级”、“剥削”等概念通过暴力进入乡村社会。阶级划分不仅彻底打破了原有乡村社会结构,而且极大地动摇了传统的价值观念,从根本上改塑了传统乡村社会的等级意识,也为阶级理论在中国的确立找到充分依据。

在近半个世纪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共产党将阶级理论广为

践行,根据革命形势的变化,对不同阶层采取不同的政策。“富农”因其特有的阶级性成为备受关注的—个阶层:—方面富农具备较为优越的经济条件,占有较多的土地和生产资料,以雇工经营或土地出租作为主要的收入来源,是革命的对象之一;另—方面富农被视为“农村中的资产阶级”,富农经济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中需要保存的经济成分。富农阶层的—重特性,使近百年来富农与新富农的命运跌宕起伏,深刻影响着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和乡村社会的发展变迁。

富农与新富农问题的研究,为探索整个近代中国乡村社会变迁的历史进程提供了新的视角,有助于准确地把握乡村社会发展的历史走向,同时为解决农村现实发展中的问题提供某种借鉴。

20 世纪 20 年代,时人便称中国的农民、农业、农村是“—个难以索解的谜”,并断言“把这个谜猜透了,中国的将来,也就决定—大半了”。^① 当前“三农”问题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20 世纪 80 年代后,以市场化为取向的农村经济改革就是以承认个人利益的正当性为认识基础,在国家制度的保障下,遵循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造就了一批先富裕起来的农民,以带动农村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富裕农民的发展状况成为我们观察和评判农村社会发展状况的重要标尺之—。作为—定条件下乡村社会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富农”和“新富农”既是乡村社会发展的内驱力,也是乡村社会发展的必然阶段。

20 世纪前期富农和新富农发展与变迁其间形成的张力,不仅具有历史价值,而且体现着对现实社会问题的理性关怀,具有现实的启示意义。正如学者所言,“在中国农人社会研究中,富农的社

① 《农民问题与中国之将来》,《东方杂志》第 24 卷第 16 号,1927 年 8 月。

会地位与历史位置有独特的研究意义”。^①“富农”问题的形成及其理论认识的演变本身,一定意义上既是中国社会结构本身演变的观念形态体现,也是改造和规划中国社会未来走向的理论范式。

二、学术史回顾

“富农”理论与相关问题是在大革命时期伴随着“阶级”概念和阶级划分受到关注的。1927年的革命运动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发展的转折点,在认真反思大革命失败原因的基础上,革命者深刻地认识到革命斗争要求对面临的社会结构进行更为透彻的研究,“人们对于社会矛盾的敏感性日益增长,使过去并不需要的关于中国社会结构的更为具体更为复杂的分析得以再现。”^②阶级结构分析的意义凸显出来,阶级问题的研究被推到社会问题的最前沿。

(一)民国时期富农问题的研究

1. 富农的概念

20世纪20年代之前,农民的划分标准主要有两种:一是按照财产的多少分为大农、中农和小农或者是上农、中农和下农;二是根据土地耕种权的不同分为自耕农、半自耕农和佃农。前者重在区分农户的生活状况,后者则强调农户的田权所属,均是以农民财产状况的划分,并无对财产获取方式的认定,因此二者均与马克思

^① 庄孔韶:《银翅:中国的地方社会与文化变迁:1920—1990》,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84页。

^② 邹静方:《中国农民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中国农民》第1卷第4期,1926年4月,第425页。

主义阶级理论的划分标准有着本质的不同。

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是以财产关系为核心的生产关系,即在生产过程中基于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而形成的雇佣与被雇佣、统治与被统治、剥削与被剥削的不平等关系。列宁以土地占有、播种面积、耕畜和作坊占有等指标作为划分农户阶层的标准,将农民分为富农、中农、贫农和雇农,并对各个阶层作了明确界定。其中“所谓富农,就是靠别人的劳动过活、掠夺别人的劳动、损人利己的农民。所谓中农,就是不剥削人、也不受人剥削、靠自己的小农经济和自己的劳动过活的农民。”^①阶级理论强调的是社会各阶层经济不平等产生的根本原因。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阶级理论构成了解读乡村社会的理论源泉。对中国农民的分析是否可以援用以剥削与被剥削关系作为划分标准的农民分层,中国的乡村社会是否存在着像俄国一样的“一个很大的富裕农民阶层”,成为政界和学界关注的问题,并由此展开“富农”概念及相关问题的讨论。

在《寻乌调查》中,毛泽东将“富农”定义为“有余钱剩米放债的。”^②在毛泽东看来,生活状况直接反映出人们对生产资料和社会财富的实际占有情况,且易于为群众在革命斗争中理解和掌握。1933年国民政府实业部中央农业实验所的农情报告认为,富农“包括乡间小康家庭及富裕农民”或指称“富农为乡村中富裕之农民,换言之,即有储蓄能力之农民。”^③可见,对富农划分标准一开

① 《莫斯科工人和红军代表苏维埃全会非常会议》,《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34页。

② 毛泽东:《寻乌调查》,《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5页。

③ 《中国经济年鉴二十四年续编》第5章,1933年版,第174页。

始便是以农民的生活状况为标准的,揭示出富农即“富裕的耕作者”^①的本质特性,但在界定中,“富农”概念的外延并不确定,即富裕的程度并不明确。此后又有以土地亩数作为衡量农民生活富裕程度的标准,虽然农民占有土地的多少并非衡量富农经济状况的唯一因素,但在其他条件基本一致的同一区域,经营面积的大小至少是衡量农户富裕程度的主要因素。

30年代后,一些学者,特别是共产党人以阶级理论为指导,逐步认识到以财产多少作为阶层划分标准的局限性。由于忽略了农村中的生产关系,从农民生活状况并无法判定其阶级属性。同时,单以财产为基础进行的阶级划分,不足以产生阶级对立,引发乡村的革命和斗争。

“中国农村派”在广泛的农村调查基础上,提出注重物质因素又兼顾社会因素的农户分类法是“基于富力而同时参照雇佣关系”^②,断言是“研究复杂错综的现代中国农村经济的最好办法”。^③他们以雇佣关系,即以所有田地的多少、所种田地的田权关系和从事农业劳动的雇佣关系三个方面划分阶级,“雇长工一人以上者”^④为富农。1933年国民政府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对部分省的农村土地关系进行调查,先行进行的浙江、江苏、陕西、河南四省调查的主持者是共产党员陈翰笙等人,在农户分类中依据“富力”标准,划分为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等阶层,其中雇

① 陈翰笙:《中国农民》,《陈翰笙文集》,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11页。

② 陈翰笙:《广东的农村生产与农村生产力》,《陈翰笙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4页。

③ 孙冶方:《论农村调查中农户分类问题》,《中国农村》第1卷第10期,1935年7月。

④ 张培刚:《清苑的农家经济》(上),《社会科学杂志》第7卷第1期,1936年3月。

佣关系成为界定“富农”阶层的主要标准。此后在云南、广西两省的调查,对农户的分类则以租佃关系分为地主、自耕农、半自耕农和佃农。对此“中国农村派”的主要领导者钱俊瑞认为,“我们用的是富农、中农、贫农、雇农,以所处经济地位来划分。他们却是用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等,以经营形式来划分。这两种不同的分类方法,决定了揭露还是掩盖阶级矛盾的根本问题。”^①在近代乡村,雇工、租佃等关系异常复杂,许多租佃关系与雇工关系发生在中农和贫农之间,许多农民既出租又租入土地,既是雇工又是雇主,既剥削他人也被他人剥削,因此以雇佣关系作为阶级划分标准同样存在着问题。尽管如此,雇佣关系的划分标准突破了单纯从生活状况或占有土地数量划分阶级的简单模式,揭示出富农生产经营方式的基本特征。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即由于人们在生产关系中的不同地位以及由此产生的剥削关系决定阶级划分的理论,不仅是对以往阶级划分的反思,更是对现实斗争需要的把握。土地改革中,共产党提出“划分阶级成分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依照人们对于生产资料的关系不同来确定各种不同的阶级。由于对生产资料的占有与否,占有多少,占有什么,如何使用而产生的各种不同的剥削被剥削关系,就是划分阶级的唯一标准。”那些“占有大量土地、耕畜、农具,自己参加主要劳动,同时剥削农民的雇佣劳动的就是富农。”^②在革命实践中,“划分成分,根据是否占有生产资料,是否

① 钱俊瑞:《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成立前后》,引自薛暮桥、冯和法:《〈中国农村〉论文选》(上),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页。

② 任弼时:《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群众》(香港版)第2卷第12期,1948年4月。

剥削他人劳动来定,而不是根据家庭生活水平来衡量。”^①这种将雇佣关系与剥削关系等同起来的阶级意识,对乡村社会的发展影响深远。

综上所述,20 世纪前期“富农”阶层划分标准大致经历了以财产为基础的划分——基于“富力”同时参照雇佣关系的划分——以剥削关系为标准的划分三个阶段。这一归纳只是一个趋向性的表述,并非截然划分。阶级划分标准的变化体现出逐渐明晰的政治性取向,是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在中国革命的实践和改造。

2. 富农的阶级性质

随着社会史论战中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性质的明确,阶级理论中“富农”具有封建性兼资本主义性的观点在党内确立。毛泽东指出,“富农约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五左右(连地主一起共约占农村人口百分之十左右),被称为农村的资产阶级。中国的富农大多有一部分土地出租,又放高利贷,对于雇农的剥削也很残酷,带有半封建性。但富农一般都自己参加劳动,在这点上它又是农民的一部分。富农的生产在一定时期中还是有益的。”^②在分析富农阶级属性时,理论界形成“农民论”和“阶级敌人论”的不同认识。

“农民论”以毛泽东为代表。1927 年,毛泽东对农村中各阶级的划分已较为具体,他指出“农民中有富农、中农、贫农三种”^③,富

① [加]伊莎贝尔·柯鲁克、[英]大卫·柯鲁克:《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北京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64 页。

②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643 页。

③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9—20 页。

农是农民的一部分。不少学者在研究中都采用“农民论”的阶级定位。^①“阶级敌人论”以朱新繁和日本学者田中忠夫为代表。朱新繁将农村人口分为地主阶级、大农阶级(富农)、中农阶级、小农阶级、农业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指出富农具有特殊的性质,一般说来不是纯粹的资产阶级,而是兼有或多或少的半封建半地主的剥削。这种特殊的性质,使他成为无产阶级决定的敌人。^②田中忠夫分析华北农民的阶级构成,将富农与军阀、官僚、劣绅、资本家和地主一并被归入压迫阶级,中农、贫农、农业劳动者和游民是被压迫阶级。^③将“富农”列入压迫阶级,视为革命的对象。

上述两种认识反映出如何认识富农封建性与资本主义性的分歧。在民主革命时期,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障碍。作为“农村中的资产阶级”的富农,在这场资产阶级革命的运动中是革命的推动力量。“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要消灭的对象,只是封建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只是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而不是一般地消灭资本主义,不是消灭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④同时富农雇工经营或出租土地,被视为具有封建剥削的性质,残酷的战争环境为严厉对待富农提供了依据。

3. 富农经济的发展

对于富农经济的发展主要存在发展论和倒退论两种相左的观

① 如王仲鸣的《中国农民问题与农民运动》、韩柱国的《河南巩县三个农村经济的调查》、[匈]马扎亚尔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李真的《中国土地问题浅说》、李尔重、富振声的《东北地主富农研究》等。

② 朱新繁:《中国农村经济关系及其特质》,新生命书局1930年版,第257页。

③ [日]田中忠夫:《华北经济概论》,北平出版社1936年版,第60—61页。

④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4页。

点。发展论认为富农经济是以“前进的资本主义成分的姿态存在”^①,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张闻天作为共产党内对富农问题特别关注的领导人之一,早在1933年,便提出富农虽被削弱但依然存在,而且在土地革命胜利之后,小商品生产在苏维埃经济内所占的优势,从广大农民群众中会产生新的富农,这是毫不足怪的^②。新富农经济在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吴满有式的新富农发展方向被认为是“未来全国经济健全发展的样本”^③。相反,也有学者提出富农经济的发展不会趋向资本主义,而是退为地主经济。陈翰笙的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认为中国的富农常放高利贷与经商,如同地主一样,许多富农出租他们的农器、耕牛及一部分土地,借以收租,所以中国的富农已经变成部分地主了。特别是由于土地的分散,赋税的繁重,谷价的激落,使他们不能趋向于资本主义化。^④ 上述对富农经济发展的两种观点,均是结合富农的性质而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社会中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作为农村中的资产阶级,富农经济会有所发展。但富农经济的发展与否,不仅与自身的条件有关,更多地还受到客观现实因素的制约,因此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富农经济呈现出发展、停滞甚至倒退的复杂图景。

① 陶直夫:《中国农村经济现阶段性质之研究》,引自冯和法编:《中国农村经济论》,黎明书局1934年版,第200页。

② 张闻天:《苏维埃政权下的阶级斗争》(1933年5月),《张闻天文集》第1卷,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359页。

③ 《关于吴满有方向》,《解放日报》1943年3月15日。

④ 陈翰笙:《现代中国的土地问题》,《中国经济》第1卷第4、5期合刊,1933年8月。

(二) 建国后富农问题研究综述

20 世纪 50 年代后,随着农业生产合作化运动高潮的来临,富农和富农经济走向被“消灭”的结局。1953 年 12 月,共产党制定了“逐步发展互助合作,逐步由限制富农剥削直到最后消灭富农剥削”^①的政策,富农在社会主义改造的运动中被消灭。这一时期,富农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何载的《谈消灭富农经济》(通俗读物出版社 1956 年版)和王传骥的《中国革命中的富农问题》(湖北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两本书。这两本书的政治性明显高于学术性,仅 20 多页的单行本可视为服务于当时政策的宣传,强调富农浓厚的封建性和残酷的剥削性,将富农视为“吸血鬼”^②,宣传消灭富农经济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死活斗争。”^③50 年代的富农问题研究,与其说是解放前相关研究的延续,不如说是宣告这一问题学术研究意义上的终结。

80 年代后期,乡村史研究逐步升温,农民问题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论题之一。特别是伴随着现代化理论的兴起和史学界研究范式的更新,富农问题被重新解读,研究视角开始从革命史向社会史、经济史转型。

1. 革命史视角下富农问题的深入研究

(1) 共产党富农政策的研究

共产党富农政策的制定与变动深刻影响着中国革命的发展进程,因此反思和总结不同时期的富农政策成为 80 年代后富农问题研究中最具成果的领域。区延佳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的

① 莫日达:《我国农业合作化的发展》,统计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56 页。

② 王传骥:《中国革命中的富农问题》,湖北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12 页。

③ 何载:《谈消灭富农经济》,通俗读物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20 页。

富农政策的研究^①,何秉孟对土地革命时期党的富农政策的考察^②,徐秀丽对 50 年代中共富农政策的研究^③,郭德宏对党的富农政策的阶段划分^④,江红英以新民主主义理论为框架的富农政策研究等^⑤,探讨了不同时期共产党富农政策的制定实施以及对革命的影响。现有的研究涉及不同时期的富农政策和策略^⑥,厘清了 20 世纪前期共产党富农政策的发展和变化,这是以往学术界对富农问题研究的主要学术贡献。但是对富农政策的研究多是革命理论视角下的解读,多为政策的复述或是简单的评判,缺少对政策制定与实践过程的深入研究。

(2) 富农性质的研究

富农性质的研究是民国时期这一问题的延续和深入,论争集中于富农阶层的定位和富农的阶级属性。

① 区延佳:《略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对富农的政策》,《近代史研究》1982 年第 2 期。

② 何秉孟:《论土地斗争中党对富农的政策》,《近代史研究》1986 年第 1 期。

③ 徐秀丽:《50 年代中国共产党的富农政策》,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时代的转折——“1949 年的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729—755 页。

④ 郭德宏:《土地改革史若干问题论纲》,《近代史研究》1987 年 3 月。

⑤ 江红英:《新民主主义理论框架内外的富农与富农经济》,《中共党史研究》2005 年第 5 期。

⑥ 关于共产党不同历史时期富农政策的研究还有:李少明:《略论土地革命时期的中农与富农问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 年第 4 期;须立:《论我党在土地斗争中对富农的策略》,《安徽史学》1988 年第 4 期;鲁荣顺:《富农问题初探》,《苏州大学学报》(哲社版)1989 年第 4 期;王建科:《党在各时期富农政策的演变》,《江苏社会科学》1992 年第 2 期等。相关的学位论文有:王好军:《中国共产党对富农阶层的认识及政策演变》,吉林大学 2005 年硕士论文;杨松:《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关于富农的理论政策》,西南交通大学 2004 年硕士论文。